



三大关系演变：中国体育转型大趋势

顾 骏（上海大学，中国上海）



作者简介：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专家，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主题演绎深化方案团队专家。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犹太文化比较研究，近年来重点关注当代社会转型，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迁和社会组织发育，担任国家民政部等各级党政部门专家和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人民网等各类媒体的特约评论员。

Evolution of the Three Relations: Transformation Trend of the Sports in China

关键词：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转型

Key words: London Olympic Games; China; sports; transformation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后起国家举办奥运会往往预示着该国体育转型拐点的到来，因为一个国家有能力举办奥运会，说明它已经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而现实力量的增强意味着原本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体育金牌，其光芒开始黯淡，国民对国家和未来的信心更多地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伴随国民关注强度的降低，国家投入则相应减少，由此跨过体育发展的巅峰时期。

但在中国，这一幕好像并没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如期发生，举国体制运行如常，国家投入如常，地方政府专注如常，体育界也执着如常。4年之后的伦敦奥运会，却显示出国人对奥运会的热情不再如常，对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夺冠的狂热不再如常。中国体育转型以国民心态变化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发出明确的信号：同国际经验一样，中国体育也已进入转型轨道。

中国体育转型尚未充分展开，但从三大关系即国家与国民关系、国家与运动员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正在发生的演变上，可以看出中国体育转型的大趋势。

1 “振兴中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转变

中国体育的核心是所谓“举国体制”。不管在严格的意义上，“举国体制”到底所指为何，就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和国民的直观感受，“举国体制”就是倾国家（体育）之力，争夺重大比赛特别是奥运会的金牌。

既然是“倾国家之力”，那么在一个经济不够发达，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投资需求旺盛的国度里，推进体育发展必定会同其他方面争夺原本有限的资源。不算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为了筹集资金，国家特许开办了两个彩票，一个是民政的福利彩票，另一个就是体育彩票。两家彩票每年发行的金额不尽相同，2011年福彩募集金额超过1300亿，体彩略少，但也超过了900亿元。媒体上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为夺取一块奥运金牌，国家需要投入7亿元”。具体金额难免有争议，但夺取金牌所费不费，则是众所周知的。

由于国家的所有产出根本上来自国民的创造，而“倾国家之力”办体育，不但花了民众钱财，还必定挤占其他可以用于民生的资金。这里的关键是长期以来，民众对此

不是毫不知晓，但仍全力支持国家办好体育，多拿金牌。就此而论，伦敦奥运会开赛之前，中国体育官员说，“金牌拿少了，会被全国人民骂的”，不是矫情之语。问题是，这句话只适用于过去，而不适用于现在。恰恰在这届奥运会上，伴随中国运动员夺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国民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过去从未出现过的诸如“中国金牌拿得越少，我越高兴，因为不用拿纳税人的钱奖励他们”的观点，也公然出现在网络上，并得到不少赞同的跟帖。

对于这类堪称异端观点，仅仅视为网民的“不理性”是不够的，因为网络表达的基本特征是“迎合”：没有广泛的接受基础，发帖者的偏激语言，只能作自娱自乐，但那叫“日记”，不叫微博。所以，表达类似感受的微博及其众多跟帖，构成了同当下中国体育密切相关的某种现象，其最值得深思之处并非明确提出了对奥运金牌及其价值的质疑，而在于明确揭示了“奥运金牌是谁的利益所在”这个命题，锋芒所指正是指金牌背后的国家与国民关系。

过去，奥运金牌是国家和国民的共同利益，国家倾其所能办奥运，国民在民生被挤占的情况下，支持国家办奥运，因为国民把奥运金牌视为“振兴中华”的符号。这不仅因为不无杜撰的“东亚病夫”帽子压迫国人多时，百年耻辱要求一个原本骄傲的民族，尽快而且彻底将这顶帽子甩掉，更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除了体育比赛金牌，没有比这更鼓舞人心的、一目了然的成就，以此宣泄内心的焦灼。2000年奥运会申办未成，之所以引发了全民族如此深切的受挫感乃至耻辱感，原因就在这里。若在今天，中国GDP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游客满世界抢购奢侈品，同样是申办奥运会失利，可能还会触发国人的失落情感，但会不会有如此强烈甚至悲情，就难以断定，因为现在我们有太多可以自豪的地方，不会单单寄托于奥运会。

正因如此，国家再要“倾其所能”，将体育金牌置于种种民生艰难之前，就难以获得全体国民的一致认可，在“纳税人”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当下，国民追问“这么多的钱投下去，到底与我何干”，成为一种逻辑必然。

“振兴中华”曾经是国民对体育寄予厚望的最好表述，也是体育承载符号价值的不用诠释的诠释，但在国力日隆的今天，国民中继续认为“振兴中华”主要靠体育的人已经



不再那么多了。面对奥运会排行榜，中国第一次出现国家与国民大面积的意见分歧。如果国家不能给国民以合理而且满意的答复，这样的分歧势将越来越大，波及面也将越来越大，而一旦得不到国民的民意支持，作为举国体制的内核，“倾国家之力”所能得到的价值将大为缩水。当金牌仅仅被视为国家脸面，而与国民福祉无关之时，举国体制所取得的成就不但难以凝聚国民，还有可能撕裂国民。在伦敦奥运会期间，网络上对于夺冠问题上的意见争执，尤其是围绕刘翔伤情的意见对立和舆论纷争，预示了这种撕裂的未来走向和扩大可能。现在已经到了国家在体育发展问题上需要真诚、严肃地听取国民的意见，并切实地调整相关政策和策略的时候了。

2 “为国争光”：国家与运动员关系的转变

中国体育以国家为本位，这是中国奥运金牌硕果累累，但健身体育发展滞后，国民体质趋于退化之矛盾背后的深层次成因。这种定位表现在竞技体育内部，则是国家利益绝对、无条件地凌驾于运动员的利益之上。长期以来，一代代运动员在“为国争光”的口号下，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牺牲青春、牺牲健康、牺牲自己的运动生涯，共同为国家从赛场上获得一块块金牌，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体育史上。

然而，正因为牺牲多多，中国体育不但散发着国民浓郁的“悲情”色彩，还透出运动员浓烈的“悲壮”色彩：从不计对运动员身体后果的训练方式，到终身没有比赛资格的“陪练队员”，到为让针对外国运动员的“秘密武器”顺利出战而故意输球，到为平衡地方利益而被剥夺参赛资格，在“唯金牌是念”的举国体制下，体育官员为“奖牌多多益善”而运筹帷幄，许多运动员难以感受“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难以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理想。运动员成为国家的“金牌机器”，运动生涯变得索然寡味。看看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人放松随意，再看看比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因为拿了银牌而痛哭，“对不起祖国”，让人无法相信这发生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古代人发明运动本是为了个体的愉悦，现代人倡导“体育”更是强调运动中个人的人格成长。当运动员完全被淹没在国家对金牌的痴迷之中，愉悦和成长是可能的吗？

在人类历史上常有国家需要国民献身的时刻，这没有什么不正常，但在运动场上，要求如此之多的运动员付出如此之大的牺牲，真的那么有价值吗？如果说，在国人普遍将金牌视为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符号的时期，这样的牺牲具有道德合理性，那当民众开始质疑体育过度功利化的时候，运动员还有必要如此牺牲吗？如果国家曾经为了凝聚民心而赋予了体育以过于功利的目标，那么，当金牌反有可能撕裂民心的时候，如此功利的效果会不会适得其反？

总而言之，运动员和比赛走向常态，是一个国家的体育走向常态乃至国家本身走向常态的标志之一。

3 “金牌策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转变

举国体制的核心是金牌战略，其微观机理是调动一切力量，确保中国运动员在同世界其他国家运动员的对抗中，夺得冠军。这意味着，其他国家运动员如果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走上赛场，那他或她面对的就不是一个中国运动员，而是中国整个国家的体育力量。其他国家运动员羡慕中国运动员可以享有几乎无限制投入的训练条件，因为凭个人经济实力，他们请不了那么高价的教练，打不起那么多子弹，付不起那么高的名医诊疗费；其他国家运动员羡慕中国运动员有那么好的陪练，他们每个人都是出于兴趣才从事体育运动，没人会主动模仿外国人来给别人当靶子；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甚至嫉妒中国运动员，因为他们可以故意输球甚至放弃比赛，让本来排行榜上落后的中国选手“后来居上”，导致外国运动员失去参赛资格。如此种种，举国体制不仅不尊重中国运动员，更导致国际赛场上公平缺失：单个外国运动员对抗中国一国之力，究有多少胜算？

如果说，过去中国全面落后，“金牌策略”不失为赶超的策略，事实也证明其足够成功。但当中国国力大为增强之时，如果仍然奉行“金牌第一”，甚至像某位教头说的“囊括银牌铜牌”，那么随着巨额金钱支撑的中国“奖牌机器”攻城掠地所向披靡，是否未来世界将分出两个赛区，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干脆出现“一赛两制”，中国运动员自个玩，其他国家在没有中国运动员的情况下一起玩？

所以，伦敦奥运会上，8位羽毛球女双队员打假球激起的观众愤慨和羽联的重罚，不是为了规则遭到蔑视，而是体育比赛在运动员及其背后国家的金牌利益之外，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还有什么关系，比如还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留下多少兴趣？当比赛纯粹变成运动员颁奖台上的自娱自乐之时，体育运动究竟还有多少意义？

在体育这个特定领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期待着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表现为共同推崇奥林匹克精神，共同尊奉“公平竞争”的价值，共同遵守比赛的规则及其内含的道德要求，更重要的是共同享受体育运动天然赋有的愉悦和乐趣。国家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之后，中国必须警惕因夺金欲望过盛而成为“败坏”世界人民享受运动乐趣的诱发因素。乒乓球从没有中国人到中国人独霸，从制定规则限制中国人，到最后取消这项运动的奥运资格来回避中国人，它所日益明显的表现出来的“自毁逻辑”，绝对不能复制到其他运动项目之中。

当然，如此说法有耸人听闻之嫌，以中国人种的局限，中国运动员不可能将世界体育运动的所有项目一网打尽，足球做不到，田径更做不到。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仅需要积极推动世界体育的发展，还应该努力使原本兴致盎然的体育变得更为精彩。